

2006卷(第2辑)(总第11辑)
No. 2 2006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 陈雨军 国际经济转轨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
- 洪银兴 以制度建设规范市场秩序
- 毛增余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
- 左大培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 张苏 王永文 王阳元 论产前R&D联盟
- 罗伯特·布瓦耶 一致性、多样性和资本主义演化：一个制度互补性假说
- 威廉·拉左尼克 本土创新和经济发展——由《中国跃进信息时代》一书得到的启迪
- 王海杰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误区
- 林金忠 论西方经济学数学化和“脱思想化”趋势的方法论基础
- 裴小革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综述
- 刘明远 关于创建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 方竹兰 论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0 Number 1 Spring 2008

Editor: David Colander

Editorial Board: David Colander,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Editorial Board: David Foray, David Foray

2006卷 (第2辑)

No. 2 2006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6 卷. 第 2 辑: 总第 11 辑/柳欣, 张宇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300-06545-7

- I. 政…
- II. ①柳…②张…
- III. 政治经济学-文集
-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172 号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6 卷 第 2 辑 (总第 11 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规 格	180 mm×255 mm 16 开本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25 插页 1	定 价	22.00 元
字 数	323 000		

出版说明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启蒙思想、传承文明、推进科学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决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经济学评论》系列文集。本文集的思想是：尊重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注重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兼容并蓄，并期望在不同学派和理论的对话中寻求政治经济学新的主流；鼓励科学创新，同时崇尚严谨学风，追求学术规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02年10月

目 录

国际经济转轨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	陈甬军 / 1
以制度建设规范市场秩序	洪银兴 / 19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	毛增余 / 34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左大培 / 54
论产前 R&D 联盟	张 苏 王永文 王阳元 / 73
一致性、多样性和资本主义演化：一个制度互补性假说	罗伯特·布瓦耶 / 90
本土创新 and 经济发展	
——由《中国跃进信息时代》一书得到的启迪	威廉·拉左尼克 / 117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误区	王海杰 / 143
论西方经济学数学化和“脱思想化”趋势的方法论基础	林金忠 / 154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综述	裴小革 / 168
关于创建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刘明远 / 185
论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方竹兰 / 213



Content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eform Practice in China	Chen Yongjun / 1
Maintaining Market Order by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Hong Yinxing / 19
Washington Consensus,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Beijing Consensus	Mao Zengyu / 34
The Prisoners'Dilemma in Medicine System Caused by Market Failure	Zuo Dapei / 54
The Nature of Pre-competition R&D Joint Ventures	Zhang Su, Wang Yongwen, Wang Yangyuan / 73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Robert Boyer / 90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Hint from China's Leap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William Lazonick / 117
Western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Wang Haijie / 143
On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alization and De-ideological Trend in Economics	Lin Jinzhong / 154
A Summary of China's Maxist Political Economy's Discussion in Recent Years	Pei Xiaoge / 168
Establishing Ecolo-Political Economics-the Objective Need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Liu Mingyuan / 185
The Role of Individual in Research of Marxism Economics	Fang Zhulan / 213

国际经济转轨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

陈甬军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透视若干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经济转轨理论及其产生背景，说明当前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走向的意义所在。全文第一部分是关于过渡经济基本理论的讨论，主要介绍国外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改革基本性质的讨论，通过对改革模式的比较分析，讨论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和任务；第三部分通过介绍最近一本重要的转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著作，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作者 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富布赖特大学访问学者。

前 言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多方面、多视角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本文的主题是通过介绍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来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为当前我们对改革问题的讨论开拓视野。

中国的改革到现在还是转轨经济研究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总的来说令人瞩目，但是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凸现。国际经济学家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05年我利用在美国富布赖特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浏览了新世纪以来国际上有关过渡和改革整体研究的大部分最新文献，试图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指导、帮助或者借鉴的理论素养。

总的来说，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的判断，呈现出在“一边倒”的主流中夹杂着不同声音的基本理论格局。所谓“一边倒”，是指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坚持的“走向资本主义”才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最终出路的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是指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肯定和对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期盼,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一个新的尝试。

根据这个基本理论格局,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过渡经济基本理论的讨论,主要介绍国外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改革基本性质的讨论,通过对改革的比较分析,讨论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和任务;第三部分通过介绍最近一本重要的转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著作,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全文旨在透视不同改革理论的国际背景和基础,说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意义所在。

第一部分 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 从两篇转轨经济的论文谈起

过渡、改革、转轨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发生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到现在 50 年左右的时间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把它叫做改革、转轨或者过渡。那么,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呢?国外主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与我们国内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里着重介绍国际上两个经济学家的观点。

一、科尔奈的基本观点

科尔奈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后来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当教授。他于 2000 年在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之一的《经济学展望》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4, Number 1-Winter 2000)。2000 年是个千禧年,当时这个杂志约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写了十来个经济领域的专题文章。关于转轨经济惟一的一篇就是他写的,其他还有关于财政问题、宏观经济等等,所以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尽管过去了 4、5 年,但却还是代表了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对转轨经济的基本认识。

科尔奈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是否完结,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是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取代。这是他的主要的观点,然后他用两个模型来刻画两个制度之间的特征。

首先,对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用 5 个方框(参见图 1)来概括:前三个是政治结构,比方说在马克思、列宁政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实际的意思就是一党制,共产党的一党领导;第二个是所有制结构,国有制和准国有

制占据支配地位；第三个是计划体制或者行政协调体制；后面两个方框是它的宏观经济特征和企业行为特征：软预算约束和卖方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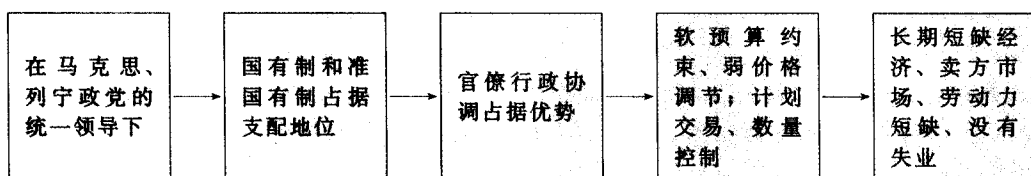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主义制度模型

同样，资本主义制度模型也可以用5个方框（参见图2）来概括：第一个是多党制；第二个是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第三个是市场协调占据优势；然后在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特征上表现为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宏观市场表现为商品富裕、买方市场，但是会产生商业性的周期波动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个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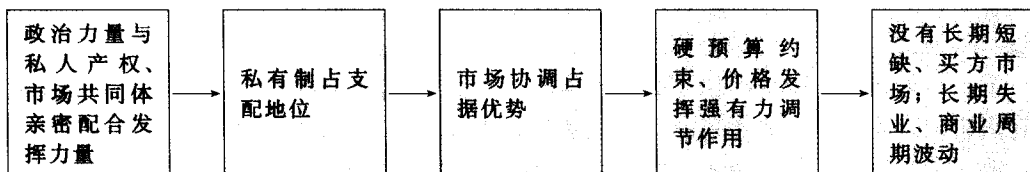


图2 资本主义制度模型

这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他认为：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从原来的5个方框开始移动的时候，就是“过渡”的开始；当它们特别是前3个方块，即它的政治结构、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协调这些方框，被后面的资本主义的前三个结构方框所代替的时候，“过渡”就结束了。

所以科尔奈的结论是：所谓的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现行的体制去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形成的基本观点。

二、萨克斯等人的观点

我要介绍的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由很有代表性的萨克斯教授和两位华人经济学家合写的。萨克斯是东欧和苏联经济改革的“大爆炸”的休克疗法的主要设计者和顾问，他原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做研究员，经常到中国作演讲；2000年，他跟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一个是杨小凯，大陆出去的，现在已经去世了；另外一个叫胡永泰，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人经济学家，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当教授，也经常来中国。这篇文章在2000年就有中译文在香港《信报》杂志发表，2003年重新翻译修改后发表在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

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 转轨的主要内容或者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 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什么叫宪政? 主要是指宪法政治, 是指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套宪法政治。所谓宪政转轨, 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他们认为, 只有这样, 整个改革才能够算完成。而只改革经济体制, 这个改革就是不合格的、不成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 当然是跟萨克斯的观点有联系的。他在文章中问道: 如果 19 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 转轨是否会更加成功? 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呢? 他的意思是讲,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 当时死了很多, 带来了社会的动荡, 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委屈了一两代人, 却造福了后来几十代人, 所以从长远来说, 这种转轨是值得的。

同时, 他们认为宪政转轨的成效不像经济转轨的成效那么容易辨认, 因为宪政转轨存在三个困难:

首先, 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 不容易彼此区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个困难在于渐进式的改革, 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 存在着与双轨制之间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渐进式改革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逐年增长, 但是双轨制和腐败会侵蚀这种成果。所以这个好处跟激进改革相比, 也很难讲。

第三个困难在于转轨或宪政改革涉及到不同几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如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的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 增加了年轻人几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 这可能增加了制度试验的多样性, 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当然, 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 它是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里实际上讲贴现的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激进改革的代价可以通过促进今后福利的增长算出一个贴现率来进行比较。

文章的结论是: 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 存在一个制度核心, 它是经济发展长期成功的根本。因此, 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 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所以,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科尔奈认为, 所谓过渡, 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萨克斯等人则认为, 过渡的本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经济运行体制的转变, 还要实现宪法政治规则的转变。所以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现在提这个观点并不是要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 而是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这么认为的。中国这几年出现的一些事情, 一些观点, 主要就是来自这个国际理论背景。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

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 不能不提到美国韦茨曼教授 1994 年提出的“中国之

谜”。韦茨曼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所谓“中国之谜”是这么一个命题：中国的改革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版本进行私有化，进行“大爆炸”，进行价格放开，但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说是形迹可疑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增长并行，而按照正宗的理论设计的苏联东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改革，却带来了经济萧条。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谜”，建议经济学回答。

一、对“中国之谜”的解释

十几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之谜”大体有四种解释：

一是“大爆炸”理论的鼓吹者萨克斯教授等的“起点不同论”。大意是说，拿中国和俄罗斯比较，就像跑 800 米，但因为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的，所以最后看谁跑得好，谁跑得快就没有意义。他最基本的观点是，中国改革的时候，跟前苏联相比，前苏联的计划性、指令性的范围大大高于中国。典型的是农村的比较：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发工资的，是与国家财政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三级体制，生产队核算，分得多分得少，工分怎么算，与国家财政没有直接的联系，农业只是向国家交农业税。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获得了强大的海外资金支持。海外华人大概有三千万人，向祖国大陆投资当时算是 3 000 亿美元，现在算是 5 000 亿美元，主要来自东南亚，包括台湾、香港地区。按照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投资和劳动力是自变量，带来的因变量自然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俄罗斯也有很多俄侨，他们是并没有拥有很大资金的商人，即使个别人拥有了很大资金，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进行投资的传统，而可能更喜欢去酗酒。过去沙皇的后代在欧洲也有不少，但是并没有多少投资者。所以中国在改革中获得了几千亿美元的支持，俄罗斯那边就没有，两者不可比。

第二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进行解释。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经济学家合作做了一个项目，对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力和资金带来的增长以外的因素，即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总的结论是，在改革之后，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了很大的增长并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

第三个是通过经济演化分析，来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在改革初期搞了双轨制，在计划体制外围发育了市场体系。苏南的乡镇企业、温州的私营企业，它没有资金、资源怎么办？就去跑国营大厂的供销科，想办法把计划配额，什么水泥钢材的弄出来，然后在小厂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就可以按照市场价来定价。后来这一块越做越大，在国有经济外围就发育出来一块很大的市场体系。有了市场价格就有市场规则。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市场体系就倒过来要求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90 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双轨价格也在 1992 年以后就并轨成为单一的市场价格。

第四是从经济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的探讨。这个理论以钱颖一为代表，主要是说中国的计划体制强调“块块”发展。一个农村公社，工农商学兵都在里面统一来管，农

机站、粮站、供销社、民兵组织等等都由公社党委领导。而苏联却是条条的，钱颖一把前面叫做 M 型，后面叫做 U 型。全苏拖拉机总局管到每一个拖拉机站，拖拉机站可以不听从所在农场的领导，但它听从拖拉机总局的领导。所以在改革当中，M 型的体制改革更容易取得成效，也就是说以块块为主的体制，在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时候更容易取得突破。

这些都是对“中国之谜”的理论解释。

二、为什么科尔奈和萨克斯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在这场讨论中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个是肯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效；第二个是在讨论中对采用的“过渡”、“转轨”、“改革”等概念形成了基本的定义，即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From Planning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这反映了经济学界对“过渡”这一概念的一般认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的文献里，一般都是指这么一个观点。

为什么说是一般“认同”呢？因为这一含义既有包容性，又有高度的抽象性。包容性就是它可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改革类型。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当时的南斯拉夫就开始了对当时实行的苏联体制的改革，当时是搞工人自治，到现在 50 年了。怎样概括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呢？有许多国家，有许多种形式，但是可以抽象出它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各种国家虽然实行不同的模式，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越南就不同，但他们有共同点，都是从计划到市场。高度抽象性是说，各个国家改革后来实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本质就是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因为不管你是什么主义、最后走什么道路，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所以，我认为这个定义是准确的，是对转轨的最基本性质的一个解释。

用这个定义来判断，科尔奈与萨克斯等的观点就不能成立。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商榷，因为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对中国改革性质的基本判断，性质的判断也就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实际走向。

第一个，它混淆了人类社会制度变革的几种形态。人类社会制度的变革，理论界的一般看法是，它有三种形式：一种就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第二种是改革，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框架里边，对经济运行机制或某些主要的管理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变革；第三种是改良，基本的制度不变，基本的管理体制也不变，对里面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进行一些细节的改变，这个叫改良。这些形态在人类的制度史上都存在。辛亥革命就是一场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原来的政体，当然也是一场革命；当然，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这三种形式的互通和转化的情况。比如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看到大清王朝没落了，就搞了一个百日维新，企图通过改良来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还有搞洋务运动，取消科举制等，最后这个社会矛盾还是解决不了，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从改良转换为革命。但是这三种形态还是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革命，就是把原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制度全部打乱，就好比要把这个楼房整个都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就是这样。当然，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也一样是改朝换代。改革呢，就是要保持这座楼的基本构架，对楼的主要房间进行重新布置，要改革，但是还是要在座楼的基础上。改良呢，这座框架也还留着，楼还在，房间还在，但是座位排得不合理，要重新排一下。这三种制度变革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虽然也存在着转换。科尔奈和萨克斯的观点就是把改革和改良全部改成革命，把改革一律当做改朝换代的革命，而且要求已经改革的国家要符合苏联东欧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还要求中国也应该以此为样本来学，不然你的改革就是不合格的、不行的。所以，混淆了制度变革的各种形态，是他们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可以从逻辑上来讲。我们讲从计划到市场是特指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50年来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虽然走的路径不同，但是它的共同性就是从计划到市场。所以可以用一个总的集合，来把这个事情都装进去。但这里边又可以分成两类，在一个大圆里面可以包括两个小圆：一个使用激进式的方式推翻原来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框架，来实现从计划到市场；另外一个是在原来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走了不同的道路，但都具有从计划到市场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小圆就可以放在这个总集合的大圆里面。现在有人拿一个小圆的特点来要求和规定整个大圆的特点，不然就不具备转轨或改革的合格形态，这个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因为你不能拿一个小的集合的性质来规定整个总集合的性质。

第三，从萨克斯的经历来讲，他修改过渡的定义实际上是在为激进改革辩护。萨克斯到处作报告，但现在不讲改革，他这几年到中国来过几次，都是讲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讲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为什么呢？明显的他当初的休克疗法是错误的，遭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谴责。失败了怎么办呢？他也不想公开承认错了，于是就说这个失败是暂时的，要用以后多少代的福利的贴现来证明，并举法国大革命的例子等等，潜台词就是说他给俄罗斯开的药方并没有错，以后会显效。

从实践层面看：他们的观点抹杀了人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趋势。西方学术界最强调学术的多样性，讲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就不容许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失败之后尝试走新的路子的时候有多元化的选择呢？为什么非得规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路？不走这条路你就死亡。所以，它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和多元化的特点。

三、转轨效果的比较

对于转轨理论上的争论，还要实践来证明。从转轨效果的实证分析来看，也不能说明一定要走东欧苏联的道路才是中国转轨的方向。改革模式的福利绩效考察，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不科学的。实证的分析，可以考察社会福利水平，具体以国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以痛苦指数为指标，它在宏观经济学里面就是对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痛苦的因素进行综合，一个是失业的增长，一个是经济的下降，所以把这两个指数经过一定的换算之后可以算出一个痛苦指数，这些都可以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进行估算。

下面以痛苦指数和 GDP 为指标来进行比较 (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各国痛苦指数表

年份	捷克	保加利亚	波兰	俄罗斯	中国
1991	4.1	13.89	12.9	—	2.33
1992	2.71	20.07	15.74	20.09	2.36
1993	3.84	29.8	18.7	163.39	2.74
1994	3.68	41.52	19.36	653.38	3.04
1995	4.43	56.47	19.47	1 933.01	3.07
1996	5.25	112.83	19.28	2 852.59	3.08
1997	7.18	1 227.76	17.17	3 272.84	3.13
1998	9	1 498.3	17.32	4 176.94	3.09
1999	11.37	—	22.23	7 750.54	3.09
总计	51.56	3 000.64	162.17	20 822.78	25.93

表 2 各国 GDP 变化率表

年份	捷克	保加利亚	波兰	俄罗斯	中国
1990	-1.2	-9.1	-11.6	-4	—
1991	-11.5	-11.7	-7	-13	7
1992	-3.3	-7.3	2.6	-14.5	12.8
1993	0.6	-1.5	3.8	-8.7	13.4
1994	3.2	1.8	5.2	-12.6	11.8
1995	6.4	2.1	7	4	10.2
1996	3.9	-10.9	6.1	-4.9	9.7
1997	1	-7.4	6.9	0.4	8.8
1998	1.4	3.5	6.5	-0.4	7.8

注: 表 1、表 2 数据均整理自《国际统计年鉴》1990—2001 年和格泽戈尔·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其中“—”表示该数据缺省, 总计数据中不含缺省年份数据。

在 20 世纪整个 90 年代当中, 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痛苦指数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前苏联加总是两万多, 中国当然也有, 二十几, 波兰好一点, 保加利亚比较大。GDP 的增长率, 中国是长期保持了正的增长, 俄罗斯基本上是负的增长, 只有在 1995 年是正的 4%, 但是它是建立在前一年的 -12% 的基础上的, 前一年降得太多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反弹, 跟前几年比的话还是负的增长; 波兰的表现稍好一点。这是整个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代价。当然俄罗斯进入 21 世纪之后, 增长率的表现相当不错, 基本上是 4%、5% 的增长率。但是普京总统最近的讲话却认为, 俄罗斯到 2010 年才能恢复到 1990 年的国民经济的绝对值。也就是说在运用了休克疗法进行转轨之后, 它的经济耽误了 20 年的时间, 或者用 20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转轨之前的经济规模。

可以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来进行中俄改革的比较, 把俄罗斯的痛苦指数作为转轨的成本, 舍去小数点就是 2 万, 中国是 26, 所以相比之下, 俄罗斯的转轨成本是中国的 700 多倍, 那怎么来弥补这 700 多倍的成本呢? 按照萨克斯的观点进行代际核算可以有两

种办法：一种是俄罗斯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超过现有的水平，用若干年超过中国，就可以把 700 多倍的改革成本弥补回来，可能就是普京总统说的 20 年的时间以外，再花 20 年时间；另外一种就是俄罗斯保持现有的 4%~5% 增长率，中国经济则长期陷入困境，经济增长进入负数，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里把 700 多倍换算过来。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概率并不大。俄罗斯除非它的经济出现重大变化，才能改变目前它主要靠能源产品来支持它的经济增长的局面，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混乱，俄罗斯则保持长期比较稳定，这种推测只能说是可能性。

所以，退一步讲，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是一种肯定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渐进式改革则有现实依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因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否定坚持采用渐进方式的中国改革，非得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用休克疗法来进行改革。

四、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

回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轴”。

在这个“主轴”中有两个重点：一是深化巩固新的经济体制，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个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主要是要为已经基本成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运行条件和环境。二是跟这个体制相匹配的，加强法制建设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一个主轴，两个重点”，是笔者对新世纪以后中国改革性质的基本判断。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改革要有个时间表，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改革、转轨、过渡就是特指人类历史上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所发生的制度变迁，所以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因为用从计划到市场定义改革，定义转轨，改革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历史事件就不是永恒的，所以这件事完了以后，改革就应该结束了；当然有时候我们还采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改革，创新意义上的改革，那在人类历史上都要存在，那种改革是永远存在的。但是特指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应该结束，不然逻辑上就不通。

所以，从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开始改革的起点，到现在 28 年，是不是还要 38 年、48 年呢？我认为按照前面的逻辑体系，在一定的時候就应该宣布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怎么判断这个时期的到来呢？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市场机制调节比重基本达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般在 70% 左右。我们可以用从 0 到 100 的区间来规定社会的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0 代表完全的计划体制，没有一点市场体制；1 代表完全市场调节，没有一点计划。这个区间是一个很抽象的

概念,一般的发达国家都是 70%~75%左右,由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和运行调节,25%~30%左右由国家进行调节。中国的改革大约从 20%左右起步,现在到了 60%~65%,还需要进一步稳定在 70%左右。

第二个,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得到基本清理和转化。就是原来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转化之后遗留的大概 2 万亿元左右的不良债权,应该得到清理。国有经济的债权和债务是同样的一笔钱,国有企业借了 1 000 万,还不了就是不良债务;工商银行放出去 1 000 万,还不了就是不良债权,这个表现在账户上,是同一资金记两个方向。这个不良的债权银行可以先卖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再打包出售,逐步消化。银行就可以逐步减少它的不良资产,就可以上市。

第三个,保证市场经济稳定有序运行的社会基本条件得以形成。

最基本的标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已经兼容,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结合并在运行中取得较高效率。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宣布中国的改革结束。当然,这个条件什么时候能够到来,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但是在理论上我们要明确改革是特指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是永无止境地改革下去,

对照上述标准,现在中国改革正处于最后阶段。28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面临最后阶段的风险。改革的风险是什么呢?或是改革遥遥无期,或者是改革转向,走向另外一条道路。所以,谨慎地把握改革的方向,积极地取得改革的突破,从而取得中国改革的最后成功,就是对科尔奈和萨克斯等理论观点最好的回答。

第三部分 转轨理论模型的构造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一部转轨经济学新作引发的讨论

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系的约翰·莫纳高斯(John Marangos)教授所著,2004 年在美国出版的《转轨经济模式的选择》(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一书,是当前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转轨理论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经济学界高度关注。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这本著作不仅是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代表作,而且可以说是 20 多年来转轨经济研究的集大成者。第二,它分析和概括了转轨的模式和基本任务,建立了世界范围内改革(转轨)的五种理论模式:新自由主义的渐进模式;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模式(休克疗法);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中国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上建立了这么一个框架,对于转轨的复杂的实践就可以有一个总体的理论把握,以指导未来的改革。第三,它的一些研究结论,对中国的改革具有很重要的启发和警示意义。